

左宗棠传论

沈传经

刘泱泱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左宗棠传论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成 杰
封面设计:罗 光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宗棠传论/沈传经,刘泱泱著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3

ISBN 7 - 5614 - 2267 - 9

I. 左… II. ①沈… ②刘… III. 左宗棠(1812—1855) - 评传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319 号

书名 左宗棠传论

著者 沈传经 刘泱泱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mm×1 168mm 1/32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462 千字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5412526/5414115/
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前　　言

19世纪初叶，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独立的封建中国没有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逐步地成为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和近代化，成为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努力追求和奋斗的崇高事业，其中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和维护国家的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尤为最主要而紧迫的任务。

左宗棠就生长在这个巨大变局与激烈斗争的时代里，是这个时代一位坚决反抗外来侵略，为中国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富强和近代化作出过多方面贡献的“爱国者”^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的一生可分为早期（1812—1852）、中期（1852—1873）和晚期（1873—1885）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具特点，而又彼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左宗棠的早期历时较长，到他1852年进入湖南巡抚幕府为止，他已是年到40岁的中年人，可谓大器晚成。在这一阶段，他科场坎坷，刻苦攻读经世“有用之学”，较长时期担任乡村教师，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等爱国人士和今文学派多有交往，逐步孕育滋长了为国家独立富强和民族振兴昌盛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往后的事业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 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光明日报》1983年10月16日。

左宗棠的中期，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以致他在初涉政坛后的 21 年的时间里，从担任湖南巡抚幕僚，到襄办、帮办江南军务，到任浙江巡抚，再到任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几乎是把镇压太平军、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作为主要任务，为自己的历史抹了黑。但与此同时，他又大力举办洋务，创办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和兰州制造局，并整饬吏治，推行社会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左宗棠的晚期，国家四郊多垒，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先是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后，继续督师西征，粉碎阿、俄侵略，收复新疆，开发西北；接着又挥戈南下，督办福建军务，率军与法国侵略者作战。与此同时，他继续兴办洋务，创办甘肃织呢总局等企业；深化社会改革，促成新疆和台湾建省。这些，都功在国家、民族，彪炳史册，是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

综观左宗棠的生平，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镇压太平军及其他人民起义；（二）举办洋务；（三）推行社会改革；（四）反抗侵略，收复新疆。而贯穿始终的一条思想主线，是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后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独立、富强和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举办洋务是左宗棠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社会，中国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巨变的关键时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

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这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还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亦未正式出现推行资产阶级文明的资产者，历史只好迫使洋务派继承和发展林则徐和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事业，在自强、求富的名义下，兴办以工业近代化为主体的洋务运动。左宗棠从事洋务，最先创办的近代工业是福州船政局，而其造船思想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他把“造炮船、火船”视为“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② 的持久之策。1860年，他代曾国藩拟撰奏折时，提出“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1864年10月，他在杭州将试制的蒸汽轮船试航于西湖，把造船思想付诸实践。在正式兴办洋务的20多年里，他是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洋务派首领，对中国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于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这个官办军用而以造船为主的综合企业，不仅是我国近代造船工业的起点，亦是近代海军萌芽之始；他创建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近代造船和驾船的科学技术，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工科和军事学堂，也是我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开始；他在西北办西安—兰州制造局，是我国西北近代工业的开端，而甘肃织呢局，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工生产的纺织厂，是近代毛纺织业的起点；他第一个用机器凿井、治理泾河，是中国水利近代化的先声；他在创办近代工业时，还在管理体制方面，由官办越过官督商办，提出官倡商办的新形式，大力支持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主动提出兴办闽台机器制糖厂；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十二页，光绪十六年开雕本。

^③ 《曾文正公全集》，第二册，第370页；第三册，第66页。

在“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① 的思想指导下，从西方大胆引进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改革和开放的一个成功先例。

改革，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恩格斯在 1847 年就说过：“由于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那些一向或多或少和历史不相称、工业尚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并指出：“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改革，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改革。”^② 左宗棠的社会改革思想与实践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镇压起义、安定社会而进行的改革，包括整理军事和整饬吏治；二是从事洋务活动时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兴办工业和教育；三是为开发边疆、巩固国防而进行的改革，包括举办屯田，发展边疆经济，促成台湾和新疆建省等。特别是台湾和新疆建省，有利于加强我国东西边陲建设，巩固国防，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项改革。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防重地，南北海道往来要冲，左宗棠一直关心台湾的主权、建设和发展。早在 1866 年，他在闽浙总督任内，就着手整理台湾军事、吏治；改善与当地高山族的关系；派吴大廷为台湾道，调刘明灯为台湾总兵，恢复由内地各标营调兵更番戍守的班戍制，并加强道员事权，为台湾后来建省奠定了初步基础。1884 年，他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在加强海防时，又专折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1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第 214 页。

切应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①。1885年10月，清政府采纳左宗棠建议，任命刘铭传为首位台湾巡抚，台湾正式建省。

新疆建省，原是由龚自珍、魏源等率先倡导。左宗棠早年受他们的影响，还在鸦片战争前的1832年就提出过新疆建省的主张。至1877年西征军收复吐鲁番后，他于5年内连续5次向清廷提出新疆建省的奏折，其中包括实施方案。终于，1884年11月，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首位新疆巡抚，废除伯克制，改军府制为郡县制，左宗棠50余年的新疆建省的宿愿胜利实现。

而且，左宗棠在西北建立近代工业，植树、修水利，以及新疆建省和税制、商业等项改革，这是我国近代开发西北的前奏，为随后开发西部起到重要作用。

左宗棠最主要的活动是反对外来侵略。这里应着重指出：由于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是近代中国的最主要的矛盾，反对外国侵略和捍卫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不仅是左宗棠晚期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一生思想活动最突出的特点。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作些分析。

从纵的方面看，反侵略贯穿左宗棠一生事业的全过程。鸦片战争时，他在远离长沙的山乡安化任私塾教师，就时刻关注战局变化，积极为反侵略战争出谋划策；揭露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时已久”；斥责割让香港给英国的琦善“奸谋误国，贻祸边陲”，主张将其定罪斩首，布告天下，“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②；颂扬林则徐抗英斗争，说清廷将林则徐革职是“是

^① 《台湾紧要请移福建巡抚以资镇摄折》。见秦翰才辑：《左宗棠集外文》（抄本）。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第十二、十六页。

非颠倒”，“上下相蒙，贤奸不辨”^①，看到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密切关注林则徐此后行踪所至，“心神依倚，惆怅相随”^②。这些表明，左宗棠步林则徐抗英卫国之后尘，走上了反侵略的爱国道路。

左宗棠在其中期，虽然忙于镇压太平军等群众起义，但并未忘记反对外国侵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是湖南巡抚的幕僚，积极为国家民族安危忧虑而出谋划策。他在给王鑫信中说，“广东夷务日棘”，“须吾省为两粤一解此患”^③。在为骆秉章代拟的奏折里，他除向清廷汇报广东情况外，还提出制敌、收复广州和保卫沿海的战略战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廷在订立《北京条约》后从热河回銮返宫，左宗棠说：“根本幸尚无恙，然辱甚矣！”^④1867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协剿西捻军时，总理衙门让其为“修约”陈述意见，他除了在《遵旨密陈折》里根据敌我形势，指出“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多方要挟”^⑤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对政治上的请觐，主张于外国使臣呈递国书时，“特允行其国君臣之礼”，此外，则“仍照中国行拜跪礼”，说如此“庶预杜其后此烦渎”；对于向外国派驻使臣，他更大力支持，说遣使外国可“以诇各国之情伪，而戢公使之专横”；在经济上，反对由外国人操纵架电线，修铁路，关于外轮运盐、开煤矿，提出“当以中国商情民情断难允从”拒绝；对于外国传教士，亦禁其“干涉公事，袒庇教

① (与周夫人) (辛丑)，《左宗棠家书》，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第6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第四十九、五十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第三十九页。

④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4页。

⑤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481页。

民”^①。这些，都反映他反对侵略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之情。1870年，他对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不仅指出教案由于外国侵略而起，而且强调“津民激于公愤”的正义性，要保护群众反侵略的热情；对外国侵略要持强硬态度，并向清廷表示：“兵端未可轻开，而兵事必期有备。所幸西事渐期顺手，如有调发之处，尚可不致茫然。”^②这反映他坚决支持天津群众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至于后期，左宗棠更以全力反对外国侵略，这是举世公认的。对于新疆，他为出兵新疆，先是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③的正确主张，筹划兵饷粮运，制定先北后南、首取乌鲁木齐的正确方针和缓进急战等的战略战术；次是在督兵西征时，粉碎英、俄阻挠干涉阴谋，指挥西征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收复了阿古柏侵占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以西的全部领土；再是对收复伊犁，提出“先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④的正确方针，以武力为后盾，克服了俄国欲挑起新的侵略战争的伊犁危机，支持曾纪泽在俄谈判，最后订立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该条约与崇厚所订条约比较，中国少丧失一些领土和政治经济权益。尽管左宗棠对此约还不满意，但这仍是近代中国反侵略的一次胜利。1881年2月，左宗棠被清廷任命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行走。在此短暂停间里，他除了针对日本近来“时有狡焉思启之谋”，“居心殊属叵测”^⑤，提出必须严密注意外，还向清政府专折提出增加鸦片税捐，以使价贵瘾减，既达到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第五十二至五十五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一，第十五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三十九页。

⑤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六，第十三至十四页。

禁吸鸦片的目的，又使“利权以渐收回，足纾积困而济时需”^①。这年10月，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在任近4年，除了积极开展洋务，兴办近代工、矿、交通各业，增强反对外国侵略的经济实力外，还大力整顿江海防务，筹划反法侵略。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之际，他力主抵抗，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派王德榜组建“恪靖定边军”开赴广西前线。当请身赴滇粤前线督师未准后，他又主动请缨奔赴福建前线，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在福州，他积极组织兵民加强防务，支援台湾，稳定福建局势，最后死于任所。

从横的方面看，左宗棠在以反对外国侵略为一生主要任务时，其他如兴办洋务，进行改革，以至镇压起义，无不与反对外国侵略密切相联。反对侵略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的突出特点。他设厂造船思想产生于鸦片战争，“造炮船火船”是他为反对英国侵略，“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②的一项重要内容。1866年，他专折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亦是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而决心仿制轮船，“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③。随后，他创建兰州制造局亦是如此。正如他在给魏源《海国图志》重版写序时所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④。随后，他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减税时说：“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他减税目的是“以维商本，而塞漏厄”^⑤。在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五，第十七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第十一至十二页。

③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0~61页。

④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57页。

⑤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九，第七十二页。

福建，他倡议兴办闽台糖厂，亦是要“收回洋商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①。这表明他兴办洋务创建近代工业，一直是把反侵略、收利权作为重要宗旨的。

至于社会改革，左宗棠亦多是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反侵略实力出发，具有明显的反侵略性质。如对新疆建省，他从新疆地处边陲，“他族逼处，故土新归”^② 出发，目的是为“疆索巩固，俄英诸强邻不敢妄肆鸱张”^③。当外国觊觎台湾之际，左宗棠改革台湾社会经济，是免“我弃而人取”，为“收长治久安之效”^④。随后，他又以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使台湾自成一省，“以资镇摄”^⑤，仍反映了它的反侵略性质。

对镇压起义，我们从左宗棠中期的活动内容来看，他在镇压起义时，没有忘记反对外国侵略，甚至有时将镇压起义服从于反对外国侵略。如在天津教案期间，他除了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要浙江等地加强戒备以防患未然外，还向清廷表示愿听“调发”，又在家书里说，“恐将不免有东南之行”^⑥。表明他在需要时可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西北奔向反对外国侵略的东南。又如俄国侵占伊犁，我国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和大漠南北面临严重威胁时，他在上清廷奏折里，揭露俄国侵略野心和提出筹划收复伊犁之策，又将原订“先规河湟”，“然后一意西指”^⑦ 以取肃州的计划，改为攻占河湟与攻取肃州同时并进。这表明，从 1870 年以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三，第五十四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九，第六十二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一，第二十一页。

④ 《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 147—148 页

⑤ 秦翰才辑：《左宗棠集外文》。

⑥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 158 页。

⑦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第五十五页。

来，左宗棠已不再把镇压国内起义作为最主要任务，而是将它服从于反对外国侵略的大局了。他攻取河湟和肃州，除了镇压起义的反动的一面外，还有为反对侵略，进兵新疆，收复故土铺平道路，打开通道的作用。

从整个发展趋势看，左宗棠反对外国侵略是与日俱进，日益发展的，特别是在其后期，更是由一个高度走向另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晚节甚好，难能可贵。

左宗棠反对外国的坚决态度和严正立场，正如他死后有人写的一幅挽联所评论：“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①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危急，左宗棠义愤填膺，改变了“原拟收复河湟后，即乞还湘”的想法，在给刘锦棠信中说：“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还表示要“生出玉门”^②。其坚强抗敌的爱国精神是何等可嘉可敬！1876年，左宗棠派刘锦棠率西征军出关，他将指挥机关从兰州迁到肃州，在那里坐镇指挥收复新疆战事，解决后方粮饷运输困难。他还多次函告刘锦棠：如前线需要，他便立即奔赴。表现了一个指挥者不畏困难，身临前敌的大智大勇精神。1880年5月，当俄国妄图挑起新的侵略战争时，年近七旬的左宗棠为了收复伊犁，从肃州“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③，于6月15日到达炎热如火的哈密。唐朝诗人王之涣曾因古人把玉门作为西行极限写了有名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左宗棠一反古人旧话，把西出玉门

^① 《左文襄公荣哀录》册二，第四页，光绪十二年刊本。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一，第四十八至五十二页；卷十二，第六十二至六十五页。

^③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43页。

写成：“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差堪告慰！”^①这种爱国心志情怀是何等高昂！同年11月，左宗棠在奉召入京以备朝廷顾问途中，写信给刘锦棠，不仅说“俄事非决战不可”，而且说：“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②。这里所说的“康熙朝地段”，是指俄国强订《北京条约》割占的黑龙江以北以东大片领土。过去，左宗棠与当时不少人一样，是主张遵守与外国已订条约的，现在，他要收回这些已失领土，实是要更改已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种思想主张，不仅高出时人一筹，亦是他反侵略的雄心壮志和爱国主义思想跃入到一个更新高度的表现。

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左宗棠在加强江海防务时，曾于1882年—1884年间四次到上海巡视，带兵持械乘轿进入外国租界。起初，外国租界以无照会持械阻拦，左宗棠怒称：“上海本中国地，外人只租借耳，以我中国军人行中国地，何照会之有？”令亲兵“枪实弹，刀出鞘而行”。结果是：“西人除道，换升中国龙旗，声炮十三响，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③左宗棠对此亦满怀豪情地说：“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④这是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卓越表现。

中法战争时，左宗棠一再主动请缨赴前线抗敌。他曾奏请去广西前线视师，立下“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的军令状，以表其反侵略的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随后，他以钦差大臣到福州督办福建军务，时已73岁高龄，还不顾风险，要亲自率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四，第二十七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四，第七十五页。

③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71页，177页。

④ 《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41页。

师渡海援台，更体现了他为国家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精神。1885年9月3日，他病情恶化，在福州逝世前，还深感白头临边，恶气未吐，壮志未酬，在口述《遗折》中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①他虽未能效命沙场，但其行为之壮烈，气节之雄伟，应与效命沙场无异；其作用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又非一般效命沙场可比。

从其一生的成就看，左宗棠一生成就是多方面的，作用是重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外国侵略，特别是不畏艰险出兵新疆，收复新疆，可谓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因为，这不是一般说的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的光辉胜利，它从侵略者手里光复了沦陷十多年的我国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其中收复伊犁，是迫使侵略成性的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②。这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是没有的，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侵略斗争史上亦是罕见的。督军光复新疆后，他又进行以建省为主的社会经济改革。这既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保卫了祖国边疆和西北的安全，又奠定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现代中国版图与新疆建设发展的基础，还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善于斗争，有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心、决心和能力，功在国家，利在民族。

至于对福建和台湾，左宗棠除创办福州船政局外，晚期督办福建军务，亲临抗法前线，对稳定福建局势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对台湾的改革和促进建省，对台湾、对东南沿海乃至全国的影

① 《申报》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373页。

响，亦是重大而深远的。

从上述左宗棠一生以反侵略为中心的四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军事上有雄才伟略，经济上能思虑深远，而且在实践中踏实肯干，更有一颗为国家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的爱国之心，是一个集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于一体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平思想活动，是一个爱国者的历程。在他一生以反对外国侵略为主的历程中，政治上成熟有为，不是无能懦夫；军事上稳妥周详，不是纸上谈兵；行动上勇敢坚定，身体力行，从不半途而废。因而在近代史上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在政治、军事、经济、改革开放和近代化各方面，留下了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宝贵经验，更向人们显示和留下了他反对侵略和为国家独立富强而奋斗终身的爱国精神和思想。

左宗棠一生的这些历史性的成就、宝贵经验和反侵略的爱国精神，是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的。

本世纪以来，有不少人重视对左宗棠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如秦翰才，用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搜集、整理、研究左宗棠的资料，在1945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受人重视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近10多年里，左宗棠更是人们重视和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并有不少论文或专著问世，对他某些方面和某些问题作了有益的论述。但是，由于写作时间、资料和工作条件的限制，上述论著不免存在某些不足，仍有继续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客观研究和正确评论的必要。

我们两人，不仅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而且由于工作地区和工作性质的关系，在左宗棠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刘泱泱不仅是湖南人，而且长期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左宗棠是湖南人，影响深远，自然成为其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他发表了《左宗棠早期思想

初探》、《左宗棠在幕府时期》、《浅论新疆各族人民对左宗棠西征军的支援》和《左宗棠研究述评》等一系列学术论文；特别是他主持整理编辑《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出版，共15册）时，曾沿左宗棠当年的足迹所至，到湘、鄂、赣、皖、浙、闽、粤、豫、冀、鲁、陕、甘、新及京、津、沪等16省市调查访问，搜集和发现了一大批左宗棠未刊资料和历史文物，对左宗棠有较全面的、具体的、新的认识。沈传经过去长期在新疆大学工作，亦因教学和工作的需要，把左宗棠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他自1973年参加《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编写工作以来，写了《左宗棠是林魏的后继者》、《左宗棠对新疆的历史性贡献》、《论新疆建省》、《评白彦虎在新疆》和《论左宗棠与中国近代化》等论文，还从事洋务运动研究，撰写了专著《福州船政局》一书。此外，他还搜集了一批有关左宗棠研究的地方民族文字和社会历史调查的未刊资料。这样，两人工作地区和工作性质的不同，不仅不影响我们研究左宗棠这个共同的课题，相反，还能在从事这个共同课题中发挥各自的长处。这种各有所长的组合，是有别于其他左宗棠研究者的最佳型结合，亦成为我们写好这部《左宗棠传论》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我们在共同撰著本书时，根据左宗棠一生镇压起义、兴办洋务、进行改革和反对侵略这四个方面，以反侵略和爱国为主题，遵照全面、系统、深入和客观的原则，在资料、结构、内容和论述四个方面作了较多的探索和努力，力求有新的突破，以显示本书与同类著作比较有自己的不同特色。

在资料方面，我们力求丰富可靠，在充分利用原有的《左文襄公全集》和其他有关重要资料的基础上，更力求增添新的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四类：一是左宗棠本人的未刊资料，这些未刊资料现已全部汇入新版《左宗棠全集》中；二是未刊的地方民族文字资料，主要是维吾尔文和锡伯文等译稿；三是未刊的社会历